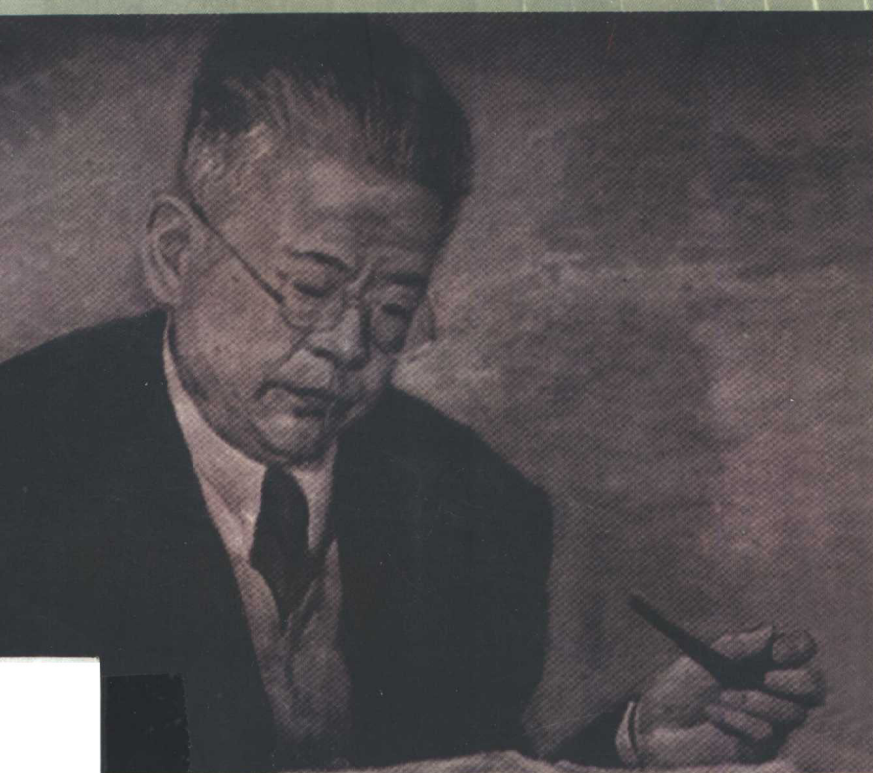


史家随笔

出入史门

傅斯年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巧丽
封面设计:顾 页
责任校对:张振华

出入史门

傅斯年著 吕文浩选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玉古路 20 号)

装 订 杭州长风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 万

插 页 1

印 数 1 - 8000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98-9/K · 437

定 价 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缘起

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自己历史的国家，史籍浩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正衣冠”几乎家喻户晓。然而，要从浩瀚的史籍中挖掘于人生、于社会有益的历史知识、经验教训，对一般读者来说，并非易事。且不说时间不允许，即使有了读史的时间与兴趣，也未必能领会其中之精义。因此，有必要在枯燥、艰涩的史籍与普通读者之间架起一座便捷的桥梁，使历史智慧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资政、教化的作用。

事实上，历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本世纪初开展的白话文运动及近代教育的普及，更为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史学工作者不仅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与时代需要挂起钩，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日益贴近平民百姓。他们以自己独具的史德、史才、史识点评社会的兴衰得失，发前人未发之覆，剖析社会发展的大势，缩短了史学与社会生活的距离，让历史知识与史家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当年，由吴晗先生主持、众多著名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小丛书”，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

今五六十岁的读者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意欲在吴晗先生开辟的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在新的时期有所创新，即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着重传播史家的智慧，即史识。这就是眼前这套“史家随笔”的由来。

“史家”指对史学研究某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而随笔作品即是五四运动以来颇为流行的一种文体，以不拘形式、借事抒情、夹叙夹议、意味隽永为特色。这就要求本丛书的作者既要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广博的历史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闪亮的思想火花。

本世纪也的确出过一些文史兼通、德才识皆备的史学大师，如郭沫若、翦伯赞、吴晗等等。他们在从事专题研究的同时，以史家的睿智观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和事，点评社会的兴衰得失，扶正被歪曲的历史人物。这些文章篇幅不长，却以轻松的笔墨传播着严谨的学识，表达了对时代、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仍有启迪意义。老一辈史学家这种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在新一代史学工作者身上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近年来，活跃于史坛的史学家们在研究专题之余，也注意写一些随笔类的短文。他们以强烈的参与意识、严谨的治学作风或对现实问题作出历史的思考，或表达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种种看法，试图为现代化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这些文章拈重若轻，娓娓道来，细细评述，贴近现实生活，耐人寻味。历史是现实的昨天，今天是昨

天的延续，谁又能切断今天与昨天的联系，保证历史不再重演呢？

由此，本丛书采取以人结集、多元开放的组合方式，在每一辑中既有老一辈史学大师随笔类的经典作品，又有活跃于当今史坛的史学专家的读史随感。从时间上看，几乎贯穿了本世纪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从世纪的高度俯瞰意味深长。在选择范围上，以大陆史学家为主，尽量吸收港台地区乃至海外史家的随笔作品，以开阔我们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史家都写有随笔作品，也不能以随笔作品的多少、出版的先后来排史家的座次。随笔作品是史家的副产品，它并不决定史家在史学界的地位。但史家随笔的严谨性、真实性、科学性却是有些随笔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在白话文产生前后，也有不少以文言文撰写的史家随笔。这些随笔也同样很有趣味与价值。但是，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本丛书暂不选入。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3月24日

在 20 世纪中国的一流史家里，傅斯年是独特的。以胡适的话来说：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最有资格说这些话。已故史家罗尔纲先生说，我不知道谁是胡适最好的朋友，但我知道傅斯年肯定是胡适最好的学生。傅斯年是五四时期胡适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一生对胡适执弟子礼甚恭；而胡适常常谦虚地说他在北大最初教书时，必须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学生中有学问比自己强的，傅斯年就是这三两个学生之一。事实上胡适一直把傅斯年引为同

辈，两人终身过从甚密。

傅斯年出身儒学世家，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他有幸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大读书，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反戈一击，从旧营垒里冲出来，一下子站到新文化的潮头。他主编的《新潮》杂志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日后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大放异彩的人物，刊发的文章较《新青年》言论更为猛烈，在五四时期影响深远。傅斯年本人在这一时期写了不少批判传统、张扬个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领域广阔，饱含学识，说理透彻精辟，独步一时。那是一个求知热情高涨的时代，傅斯年在北大，日后在英伦、在德国如饥似渴地研究、浏览文史哲、心理学、物理学甚至地质学等种种学问。也许部分是由于想摆脱混乱的时局影响的缘故，他最终选择了古史。

傅斯年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辉煌的贡献是，他树立了史料学派的大旗，写下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同时手创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经艰难困苦，主持工作 20 余年之久。该所聚集一批一流学者，完成了包括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抢救整理在内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傅斯年在这些工作中，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能够驾驭大场面的卓越的学术行政才能。

在专深的学术论著之外，我们也能领略到他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而又逸趣横生的短章，不因才气横溢而流于浮华，不因学识渊博而掉书袋子，真正地集才、学、识于一身，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傅斯年真正专心做学问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超过10年。30年代以后，他十分关心政局变化，写下了大量时论文章；抗战以后忙于史语所行政工作，又热心地在国民参政会论政，针砭时弊，颇动一时视听，被时人誉为“傅大炮”。他的时论文章，往往纵论古今，激扬文字，判断力过人。据说他是当时写时论最懂军事的两个书生之一（另一个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如果傅斯年不问时事，专心著述的话，以他独具的优厚的学问禀赋，必然能够对史学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自己那么做。他说：“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所以一事无成也。”对自己的性格，他分析道：“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看来，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西方哲人说“性格即命运”，在傅斯年身上又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验证。

这本随笔集的选目，大体上有三类文章。一种是直接与史有关的史学短文；一种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民族性的反思；一种是有关社会、政治、文化的时论，主要选纵论古今，能表现出史家眼光、史学智慧的篇什。间或也选有几篇较长、较短的，因考虑到重要性、全面性和可读性而未忍割爱，少数文章因故

由編者在極個別的地方作了一些技術性處理。希望本書能有助於讀者朋友們走近傅斯年。

呂文浩

1998年3月

目 录

目

录

卷首语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1)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12)
故书新评	(14)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15)
马叙伦著《庄子札记》	(24)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29)
万恶之源	(33)
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想》附记	(39)
出版界评	(41)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42)
中国狗和中国人	(45)
随感录(选二、三)	(49)
一段疯话	(53)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57)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59)

出入史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70)
	官家民间记载之比较	(83)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87)
	论伯希和教授	(90)
	为购明清档案事致蔡元培书	(95)
	《城子崖》序	(97)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	(103)
	跋《人境庐诗草》	(109)
	闲谈历史教科书	(111)
	倪约瑟(李约瑟)博士欢送词	(125)
	陈独秀案	(128)
	政府与提倡道德	(137)
	教育崩溃之原因	(142)
	论学校读经	(150)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157)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161)
	一夕杂感	(165)
	北方人民与国难	(172)
	盛世危言	(179)
	天朝一洋奴一万邦协和	(188)
	“五四”偶谈	(194)
	“五四”二十五年	(198)
	评英国大选	(203)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210)
2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219)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三年以前，英国杂志名《十九世纪与其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者，载一推论东方民性之文，作者姓名与其标题，今俱不能记忆，末节厚非东方文明，印吾心识上者，历久不灭。今举其词，大旨谓：

东方学术，病痼生于根本；衡以亚利安人之文明，则前者为无机，后者为有机，前者为收敛，后者为进化。质言之，东方学术，自其胎性上言之，不能充量发展。倪喀郎(Chalons)之役，都尔(Tours)之军，条顿罗甸败北，匈奴或大食胜者，欧洲荣誉之历史，将随罗马帝国以覆亡。东方强族，纂承统绪，断不能若日耳曼人仪型先民，与之俱进。所谓近世文明者，永无望其出于亚细亚人之手；世间之上，更不能有优于希腊，超于罗马之政化。故亚利安族战胜异族，文明之战胜野蛮也，适宜文明战胜不适文明也。

迺录此言，以启斯篇。当日拘于情感，深愤其狂悖，及今思之，东方思想界病中根本之说，昭信不

诬。缩东方之范围，但就中国立论：西洋学术，何尝不多小误，要不如中国之远离根本，弥漫皆是。在西洋谬义日就减削，伐谬义之真理，日兴不已；在中国则因仍往贯，未见斩除，就令稍有斩除，新误谬又将代兴于无穷。可知中国学术，一切误谬之上，必有基本误谬，为其创造者。凡一切误谬所由生成，实此基本误谬为之潜率，而一切误谬不能日就减削，亦惟此基本误谬为之保持也。今欲起中国学术思想界于较高之境，惟有先除此谬，然后从此基本误谬以生一切误谬，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欲探西洋学术思想界之真域，亦惟有先除此谬，然后有以相容，不致隔越。欲知历来以及现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状况何若，亦惟有深察此弊之安在，然后得其实相也。

至于此种误谬，果为何物，非作者之陋所能尽量举答。故就一时觉察所及，说谈数端，与同趣者共商榷焉。

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

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西洋学术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治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曰，“俱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曰，“功莫大于存古”。是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现于文学，则以仰纂古人为归宿；现于哲学，则以保持道统为职业；现于伦理，则忠为君奴，孝为亲奴，节为夫奴，亲亲为家族之奴。质而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有个性之发展，但为地下陈死之人多造送葬之“俑”，更为招致孝子贤孙，勉以“无改于父之道”。取物以譬之，犹之地下之隧宫，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

明，詎可得耶？

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持论不同，望空而谈，思想不宜放之无涯之域。欲言之有当，思之由轨，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详审时代之关系。与事实好合无间，亲切著明，然后免于漫汗之谈，诏人而信己。故学说愈真实者，所施之范围愈狭，所合之时代愈短。中国学者，专以“被之四海”，“放之古今”为贵，殊不知世上不能有此类广被久延之学说，更不知为此学说之人，导人浮浅，贻害无穷也。

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肆，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袭，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一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际涯。举其萃著者言之：则学人心境，造成褊浅之量，不容殊己，贱视异学。庄子谓之“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究之，天下终不可易，而学术从此支离。此一端也。其才气大者，不知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肆之程度

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燭火争光。清代学者，每有此妄作。惠栋、钱大昕诸人，造诣所及，诚不能泯灭；独其无书不读，无学不肄，真无意识之尤。倘缩其范围，所发明者，必远倍于当日。此又一端也。凡此两者，一褊狭而一庞大，要皆归于无当；不知分工之理，误之诚不浅也。

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举例言之，细绎封建之理，评其得失，固史学家当务之急，若求封建之行于后世，则谬妄矣。发明古音，亦文学界之要举，若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反之醇古”，则不可通矣。历来所谓读书致用，每多此类拘滞之谈。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又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剗切，势必流入浮泛。他姑不论，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龢、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今日最不可忽者：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

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西洋近世学术，发展至今日地步

者，诚以逻辑家言，诣精致远，学术思想界为其率导，乃不流于左道也。名家之学，中土绝少，魏晋以后，全无言者；即当晚周之世，名家当涂，造诣所及，远不能比德于大秦，更无论于近世欧洲，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沉沦，此其一大原因。举事实以言之：墨家名学“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引古人之言以为重，逻辑所不许者。墨子立“辩”，意在信人，而间执反对者之口，故有取于此，立为“第一表”，用于辩论则可，用于求真理之所在，真理或为往古所囿。魏晋以后，印度因明之学入中国，宜乎为中国学术之助矣。然因明主旨，在护法，不在求知。所谓“世间相违”，“自杀相违”者：逻辑不以为非，而因明悬为厉禁。旧义不许自破，世间不许相违，执此以求新知识，诟有得者？谈名学者，语焉不精，已至于此，若全不解名学之人，持论之无当，更无论矣。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方式。如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前辞为前提，后辞为结论。比喻乃其前提，心中所欲言乃其结论。天之二日，与民之二王，有何关系；说者之心，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取天之一日，以为譬况；一若民之所以无二王者，为天之无二日故也。此种“比代推理”宜若不出于学者之口，而晚周子家持论，每有似此者。孟子与告子辩“生之为性”，代而取喻于“白羽”、“白雪”之“白”，径执“白”之